

Trade Liberalization: the Recent Experience

货币自由化的近期经验

贸易自由化：目前的经验

1. 导言

本文大部分内容将讨论拉美国家贸易自由化的过程。最近十年来这些国家已实行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政策使其贸易体制自由化。在这期间无论从广度上还是从深度上讲，这个区域内的几个国家所实施的贸易自由化政策是史无前例的。在宏观经济失控及经济发展停滞下，贸易自由化只是整体公共政策调整的一部分，其目标是达到市场导向的经济环境。它是由广大民众支持下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执行的。文章的后半部分讨论前苏联的贸易体制。随着共产主义制度的崩溃，那里的政治背景完全不同于拉美国家，缺少政治，经济制度服务于正在形成的新的市场导向的经济秩序。

本文是根据我们同A. Choksi 合作研究项目“贸易自由化的经验”取得的成果写成的，该研究得出成功（也就是持久的）贸易自由化政策的标准，并试图评价贸易自由化政策带来的短期经济效果。本文还试图评价近期拉美国家贸易自由化浪潮成功的潜在可能性。对于东欧国家，重点将放在描述目前的贸易制度，并概括贸易改革的基本要素。

文章的第二部分是我们研究成果的总结：导致持久的贸易自由化的要素是什么，以及贸易自由化对经济的短期影响。文章的第三部分讨论拉美国家及东欧国家最近自由化政策的情况，并与早期研究结果相比较进行评价。由于拉美国家的情况与东欧国家的情况截然不同，因此在讨论拉美国家贸易自由化时，实证研究的证据更丰富，本质上有不同。文章的第四部分，用最近自由化实验新的证据来支持前面所做的推断，并列出来未解决的问题。拉美国家的证据局限于单方面贸易自由化，这部分不试图对拉美国家已加入的贸易组织象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南美共同市场进行评价。

2. 成功的自由化和经济成本

¹ 参见Michaely, Michael, Demetris Papageorgiou, and Armeame Choksi, 1991.

“外贸自由化：发展中国的经验教训”，Basil Blackwell, Oxford, England, and Cambridge, Mass. Volume 7.

² 这部分是来自Papageorgiou, Demetrios, Armeame M. Choksi, and Michael Michaely (1990). 的“发展中国家的外贸自由化，经验教训”一文，世界银行，华盛顿特区。

(i) 成功的自由化之基本要素

这部分研究的范围是广泛的。该项研究对处于不同经济程度的十九个国家，三十六个不同自由化阶段进行了分析。它覆盖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一九八四年之间，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每一次重要的贸易自由化。研究的结果显示，尽管贸易改革过程的复杂性及每一次尝试自由化遇到的条件不同，然而，成功的（即持久性）方案都具有共同的要素：

势头。大胆地实施并随之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方案比犹豫不决的方案更具有持久性。

减少数量限制(QRs)。具有决定性减少或取消象进口配额这类直接干预的方案，总地来讲是成功的。未减少限制的方案通常是失败的。这是研究中得出的最明显的结论之一。

竞争性的实际汇率。大多数成功的方案都始于（名义的及实际的）汇率的贬值。然而汇率与成功的方案之间并不存在一个特殊的趋势，但大多数持久的方案避免了实际汇率的大幅度波动。

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总的来讲，成功的改革者较失败者能使与国内生产总值有关的预算赤字保持在较小的程度。事实上，与其他任何因素相比，如既得利益权力和短期失业，非贸易自由化与不良宏观经济政策的关系有更密切。

适当的改革顺序。当资本市场自由化先于贸易自由化时，方案趋向失败。

政治稳定性。改革一旦实施，很难在不稳定的政府环境中持续下去。

该项研究最重要的结论之一是：强方案在初始阶段比弱方案持续的长久。根据该项研究，十九个贸易自由化阶段被划分为强方案，十七个被划分为弱方案。其中五个强方案（占26%）及七个弱方案（占41%）被推翻。这些数据低估了坚决改革的优越性。该项研究给自由化阶段下了定义，其中排除了那些在两年内流产的自由化阶段。如果把这些不成功的改革阶段计算在内，它们势必归于弱方案类。因此，持久改革的重要准则表现在改革的勇气上。

³ 详细分类参见“外贸自由化”一文。

该项研究同时发现，贸易自由化方案存在六年以上，最有可能持续的长久。这可能是因为六年期间通常已完成一个政府向另一个政府的过渡。通常这种过渡向改革提出最强烈的挑战。另外，新的一批既得利益集团通常产生于更有效的经济环境中，该环境产生了推翻自由化进程所需的政治阻力。

高度非自由化贸易体系几乎总是广泛采用数量限制原则，放宽这些限制已成为持久的自由化方案的重要内容。其他因素能解释这些结果吗？例如，采取主要放宽数量限制的方案也可同时大量消减关税吗？答案是否定的。具有基本数量限制的方案在关税改革上有很大的不同：关税有时是减少的，有时是增加的，有时则保持不变。

贸易自由化执行时，实际汇率的贬值与持久的改革之间的关系似乎在每一个阶段中都很明显。大部分持久的贸易自由化阶段在改革一开始都经历了实际汇率贬值。其余阶段则保持不变。没有一例完全持久的改革一开始就伴随货币增值。大多数的改革开始出现实际汇率贬值，同时未成功改革阶段的实际汇率变化则一分为二，一半上升，一半下降。实际汇率的变化趋势在自由化过程中及后阶段是不明显的。

宏观经济政策在自由化中所起的相关作用是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并维持其实际下降。该项研究只发现一个完全持久的改革阶段是在扩张的财政政策下进行的。贸易改革初期财政与货币政策的特点在部分持久的方案及完全失败的方案之中是没有区别的。

在改革阶段末期宏观经济政策似乎对改革成功与失败起了较大的作用。持久的改革通常伴随着一个限制性的或中性的宏观政策。在改革末期，如果财政政策是扩张性的并伴随适当的货币政策，在最好的情况下，总体上失败的方案仅能达到局部上的成功。该项研究显示阻止贸易改革的最关键原因是膨胀的财政及货币政策。

拉美国家是在多种经济情况下开始的贸易自由化改革。这些不同的初始经济条件与最终的改革结果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在有可能过渡简化的风险下，初始经济条件可分为三大类：经济萧条，经济平稳，和介于中间情况。该项研究显示在经济发展吃紧时，实施的自由化方案趋向于进展迅速，相对地持欠。在接近稳定的经济条件下，尤其在早期改革成功阶段后实施的方案进展得也相当令人满意。介于中间的例子——在经济出现恶化迹象但又未完全爆发危机时实施的改革方案——成功的可能是小的。

通常贸易自由化是与其他经济改革同时进行的，特别是减少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管理。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即这样一套改革顺序对贸易自由化成功的机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不象在该项研究中对贸易改革

的成果分析那样理想，主要有两个原因，资本市场自由化不是该项研究的主要方面，并且贸易自由化阶段很少伴随资本市场改革，该项研究分析调查了四个例子，证据很少，远不足以得出最终结论，但至少该证据支持这样一个假设：即广泛的资本市场自由化应在贸易自由化扎实地执行之后进行，确切地讲，其不应超前于贸易自由化。

其他影响改革而与改革本身的设计或所伴随的经济政策无关的因素存在吗？该项研究调查了这样几个因素：经济规模，国家收入水平，地理大小，天然资源，关于这方面，政治稳定性是最明显的因素，其主要指标是政治的连续性，这并不意味着在一个相当的时期里，需要一个连续民主或专制的政府。

(ii) 短期经济成本

政府主要考虑贸易改革的短期经济效益，只有将资源从无效率的使用转移到新的用途上，贸易改革才会成功，所规划的长期获益越大，所需要这种转移也越大，长久的远期收益要求坚决大胆的贸易改革，对资源的再分配有明显的作。但这种短期资源再分配带有经济成本及政治风险。

在审慎的贸易改革中，通常有四个主要关心的问题：国际收支平衡的恶化，国民输出下降，失业增加及收入分配恶化，该项研究仔细地研究了这些关心的问题，发现了对付出高代价的担忧，并惊奇地发现，即使是在短期内调整的代价也是非常小的。

在大部分自由化阶段中，改革方案开始实施随后的数月里，这些国家增加了外汇储备，大多数案例显示自由化挽救了储备下降的国家，的确，迅速恶化的外部地位经常是为什么要首先进行改革的原因。

在一半左右的贸易改革阶段中，自由化实施后的数月里，进口迅速增加，多数是由于放松数量限制，其他改革阶段进口则显示不出任何趋势，只有四个改革阶段进口是实际下降了。

因为进口总的来讲或无变化趋势或增加，总体国际收支平衡的改善势必是出口增加的结果，事实的确如此，按不变美元计算，对三十一个改革阶段的货物贸易现有的数据取平均值看，年出口增长率自由化前三年是42%，而自由化当年及其后三年年增长率为11%左右，更惊奇的是出口执行情况的改进即迅速又好，使国际收支平衡立即得到改善，反应速度之快也许部分是贸易流量的投机活动对大幅度的预期贬值作出的结果。

⁴ 一个国家政治稳定或不稳定的概念仅仅是指贸易自由化执行期间。

短期内国民输出情况如何呢？贸易改革尤其是坚决改革，一开始就与较高的增长有联系。所有改革阶段在改革前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4.4%，自由化及其后三年是5.6%。强自由化阶段相应的增长率分别为3.5%及5.4%，弱自由化阶段为5.6%及5.7%。

自由化在短期内对就业的影响，数据表明是很小的。这个证据不是根据所有的案例作出的，因为通常无法得到详尽的数据。不过在该项研究中的大多数国家就业并不低，即使是在主要以个人经济为主的部门中，例如，制造业。这显示劳动力的再分配大部分是在部门间完成的，因而引起的破坏比以前担心的要小。

在规划贸易自由化时，政府主要关心的或许是改革对收入分配的短期影响，而不是国内生产总值。无论调整的代价多大，他们担心穷人的收入会不成比例的下降。如果短期输出及就业下降，这个风险有可能很大，但是证据表明自由化对国民输出的短期影响是强有力的，对就业的影响最差不过是中性的。

自由化对收入分配确切影响的证据是混合的，支离破碎的。这个问题尚待探讨。没有可靠的证据显示低收入群体从自由化中得到特殊的利益（超过共享的整体好处）。同样也不支持流行的观点，认为改革使穷人摆脱贫困。

3. 拉美改革近期自由化改革

最近的拉美贸易自由化浪潮始于一九八五年玻利维亚及墨西哥，乌拉圭于一九八七年，阿根廷及委内瑞拉于一九八五年，巴西，厄瓜多尔及秘鲁于一九八〇年（参见表一）。其他几个拉美国家也进行了贸易自由化（哥斯达黎加于一九八六年，危地马拉于一九八六年，洪都拉斯于一九九〇年，牙买加于一九八五年，巴拿马于一九八一年，巴拉圭于一九八九年，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于一九八五年），但是它们的改革进程缓慢而且不确定。此外，由于缺乏综合性数据，在回顾拉美国家自由化政策时，很难将它们自由化经验包括进来。

该项研究所涉及的改革中有五个国家（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秘鲁，乌拉圭）曾在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试图进行外贸自由化。自由化政策在阿根廷，巴西，秘鲁，完全失败，在哥伦比亚部分成功，在乌拉圭持续下来。另外四个国家（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墨西哥，委内瑞拉）则是第一次认真，坚持不懈地进行自由化，推翻了保护主义政策。

虽然对自由化还不能给予历史性判断，自从自由化实施若干年来，还是可以从发展中看出发展的模式。参考早期研究成果，是否也可以推断出这种模式呢？

经济环境是贯穿拉美国家进行自由化的主线。除哥伦比亚及委内瑞拉外，其他研究中的国家都面临着严重的宏观经济问题，其余七个国家及委内瑞拉除宏观经济稳定问题外，自由化是若干结构改革之一。的确，贸易自由化是拉美国家为减少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扩大公共财产私有化，稳定经济所制定的政府政策的整体组成部分。

在回顾贸易改革事实时，重点是根据早期研究成果是否呈现出改革的持久性。我们首先考察一下属于来自于成功自由化的设计案例，接着考察短期的经济效果。

(i) 贸易自由化设计

早期研究最明显成果之一是在改革初期坚决、大胆的贸易自由化与其成功有较强的联系。如何将这九个改革国家与早期研究的类似情况进行比较呢？

表二详述了有关的政策因素。除一例外，在所有其他案例中，关税水平的下降及税率分散的同时，数量限制（QRs）在较大范围内减少。表三提供了关税结构在自由化前及其后的比较，这些结构的对比是很值得注意的。例如，玻利维亚的税率范围在自由化之前是0%至100%，而改革后税率只有两个，5%及10%，厄瓜多尔的税率范围在改革之前是0%至338%，改革后范围为0%至20%，甚至于改革较温和的国家，委内瑞拉，关税范围由改革前0%至135%变为改革后一九九一年的0%至50%。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改革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大部分短于四年，有些是在二年之内（阿根廷，玻利维亚，秘鲁）。

改革是如何对待数量限制的呢？早期研究确定，持久自由化和改革初期数量限制的减少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的确在早期研究里，强自由化同减少数量限制几乎是同义词。表四总结了数量限制的初始条件及在自由化后期的情况。除了乌拉圭在七十年代早期自由化中取消了所有数量限制，其他国家数量限制是一个多种形式的复杂体系，例如，进口许可证，外汇分配，限制进口清单，直接进口禁止品。到改革后期，四个国家（玻利维亚，巴西，厄瓜多尔，秘鲁）实际上没有数量限制或者没有任何关税壁垒的存在。在阿根廷2%左右的地方制造业受数量限制的保护，主要是汽车工业。厄瓜多尔只有1%的关税属于进口许可证；即使是墨西哥，所保留的数量限制仅覆盖了20%的地方贸易产品。

⁵ 例如，放宽内部市场管理，私有化及金融系统自由化的限制。

这些数量限制主要是针对出口活动的石油工业。在改革之前具有广泛数量限制的八个国家中，委内瑞拉保留了最高的数量限制水平，仍对18%的进口额进行限制。

根据早期研究，有关改革的强度及数量限制实际减少的证据显示，贸易改革成功的机会是可喜的。除了委内瑞拉推翻部分改革外，至今这些改革一直持续下来。

实际汇率的作用在贸易自由化一开始就引入了。表五描述自由化后期实际汇率的变化情况。早期研究显示在自由化引入时实际汇率的贬值与自由化的成功之间有较强的联系，在自由化后期同样存在这种现象。来自九个改革阶段的证据是混合的。在初期阶段，六个国家经历了实际汇率的贬值，它们是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墨西哥、秘鲁、乌拉圭、委内瑞拉。其中玻利维亚、墨西哥、委内瑞拉的实际汇率贬值很大，超过15%。阿根廷、巴西、厄瓜多尔的实际汇率则上升，其中阿根廷最大，巴西只是暂时性小幅上升，厄瓜多尔也很小。

在自由化过程中，实际汇率的变化趋势是混合的。以阿根廷为例，实际汇率持续上升，到自由化后期其上升高于自由化前三年的平均值。玻利维亚的实际汇率持续贬值伴随一些波动，在改革后期，相对于贸易自由化前有所贬值。巴西的实际汇率在整个自由化过程中显现出明显的波动，但在自由化后期，实际汇率与改革前三年保持同等水平。总的来讲，在自由化过程中，三个国家的实际汇率上升（阿根廷、厄瓜多尔、秘鲁），其他三个国家的实际汇率持续贬值。另外二个国家的实际汇率没有显示出单向变化趋势。墨西哥的实际汇率在自由化前半阶段持续贬值，但在后阶段改变其方向开始快速上升。

在自由化后期，阿根廷、秘鲁的实际汇率比自由化前三年平均值高得多。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墨西哥及委内瑞拉的实际汇率贬值许多，而巴西、乌拉圭则没有变化。

这个证据提示，这些国家实际汇率的行为对自由化支持不十分有效。大幅度持久的贬值对贸易部门，特别是对出口是一个强有力的推动，限制进口的快速增长。

早期研究显示，财政及货币政策是推翻贸易改革最重要的单一因素。有几个国家在改革中判断通货膨胀的进程，控制财政及货币政策的工作中都做得很出色。阿根廷、玻利维亚、墨西哥、秘鲁及委内瑞拉在改革过程中真正地减小了它们的通货膨胀。厄瓜多尔、巴西未能降低通货膨胀。但是在二者间不同的是，厄瓜多尔保持年通货膨胀率在45%至50%，而巴西维持在极高的通货膨胀水平上。哥伦比亚的增长是轻微的，乌拉圭由于受阿根廷及巴西通货膨胀的影

响,增长是急剧的,通货膨胀增长了一倍,即100%。从自由化后通货膨胀率可以看出,到目前为止,玻利维亚,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墨西哥,秘鲁及乌拉圭已经控制住通货膨胀,这表明财政及货币政策一直有效,委内瑞拉却没有达到这一点。

汇率政策是随着贸易改革的引入及资本市场自由化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所有国家统一了它们的汇率。阿根廷固定名义汇率,而其他国家名义汇率是具有弹性的。所有国家都允许个人及商业买卖外汇。

对所有国家来讲最首要的需要是稳定,结构改革也要求如此。结构改革意味着公共部门的作用发生相当大的变化,除了贸易自由化外,还要进行金融自由化,进一步减少政府的管理及扩大公共财产私有化。除哥伦比亚外,玻利维亚及厄瓜多尔变化不大。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秘鲁及委内瑞拉就是这样作的。稳定性政策包括紧缩货币政策及实行非常高的实际利率。高利率的综合效果一方面是公共财产私有化(包括公共事业),另一方面是带来了实际而持久的资本流入。当资本市场随商品贸易自由化,资金的流入引起实际汇率变动比在缺乏这些条件下实际汇率的变动或贬值少许或上升一点。

当这些国家着手进行自由化时,经济的初始条件从总体上讲是崩溃的。表6总结了在改革刚开始时其贸易体系及宏观经济情况。所有贸易改革都是始于经济严重萧条情况下,要求强烈迅速的改革。除高度贸易保护主义体系外,大部分国家(不包括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年通货膨胀率已超过40%。四个国家(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秘鲁)通货膨胀率超过1000%,另外三个国家(厄瓜多尔,墨西哥,乌拉圭)虽然通货膨胀较低,但是仍然非常高。政府除实施既强有效又可信的改革方案外无其他选择。

关于贸易及资本市场自由化顺序,所有国家都是在资本自由化之前或同时引入贸易自由化。玻利维亚,秘鲁,乌拉圭及委内瑞拉是同时引入这两个市场自由化的。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及厄瓜多尔则是分开进行的。这种做法是同假设一致,即资本市场自由化需等到贸易改革开始实施或在其后引入。

这些自由化阶段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改革所实施的政治环境。除委内瑞拉发生多起暴力事件及两次军事政变外,其他国家的改革得到了公众的全力支持。改革是由民选政府所实施(不同纯度的民主政府)。有些国家已经受住了一个政府向另一个政府的过渡(巴西,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墨西哥及委内瑞拉)。政治过渡是考验改革是否长期成功的一个重要指标;只有委内瑞拉在考验中失败。

⁶ 弹性就波动而言,各国弹性汇率的证据就是中央银行的介入。

(ii) 短期经济成本

在这部分中论述自由化短期经济效果的两个主要方面：国际收支平衡及国民输出。表七，表八显示进口在自由化前及改革过程中完成的情况。来自各国（阿根廷，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秘鲁，乌拉圭及委内瑞拉）的证据显示，有六个国家自由化后的出口增长率平均比改革引入前高。哥伦比亚自由化后出口增长只有把自由化当年计算在内，才呈现出升高。进口方面，七个国家自由化后的平均进口增长率均较自由化前增加很多（阿根廷，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秘鲁及委内瑞拉）。巴西将自由化当年计算在内时，进口率较改革前高。乌拉圭的进口增长率于自由化后下降。所有改革阶段平均地看，出口在自由化前三年年增长为43%，自由化后上升到70%。同样重要的是，出口增长率从自由化前一年的24%，升高到自由化实施当年的74%。

进口完成情况的变化在自由化后更具有戏剧性变化，从自由化前负15%升至自由化后的13% - 14.5%范围。

从不同方面看贸易流量，贸易完成情况用每个国家进出口衡量，结果是不同的。将自由化当年计算在内，自由化后实际年均出口增加了38%，而自由化前，其年增长为7.4%，相应地自由化后进口增加了30%，而自由化前，年增长为负4.9%。

很明显，尽管没有产生贸易赤字，进口增长较出口增长的快，进口的快速增加可以解释为是由于自由化的扩大，自由化前进口不足以及目前的资本流入。

证据同时显示，若不将自由化当年计算在内，国内生产总值的加速增长与自由化同期发展是一致的。贸易改革的当年，这九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是下降的（-0.9%），其中六个国家（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墨西哥，秘鲁及委内瑞拉）在贸易改革引入的当年，国内生产总值为负增长。无疑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是与同期实行一系列坚定的稳定改革措施是分不开的。这九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在自由化改革后若干年呈加速增长。

很明显，自由化同较低的经济增长没有任何联系，如果有的话，则是强烈、迅速的经济改革与较高的经济增长有关。这就支持了早期研究。遗憾的是缺乏数据，不能预见性的对自由化，就业及收入分配做更多的系统性研究。即使有就业及收入分配相关的数据，也很难从稳定性政策及其他结构改革的效果中将它们与自由化的关系分离出来。

(iii) 与早期经验的比较

基于战后自由化阶段的经验，我们对拉美国家目前的改革持久性能作出什么样的结论呢？是否在它们的贸易体制下，自由化设计能比现在的更好？是否采取其他的途径贸易自由化会进行的更好些，也就是说能增加改革持久性的机会及减少过渡的经济成本吗？

一个国家的贸易改革执行的情况同另一个国家有很大差别，所以这里回顾的证据来自对九个自由化国家一些一般共同性的观察。证据十分肯定地显示，它们的贸易改革设计本身是好的。同早期研究指出的持久自由化特征相吻合，在稳定及确保实际汇率上升相互作用的环境中，只是对它们未来成功不十分肯定。

从改革迅速实施的事实上，显示了改革的坚定，可靠及决心，改革坚定地从事数量限制着手，大幅度减少数量限制。数量限制的下降是早期研究发现的，是反映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所以八个国家的数量限制已大幅度下降或取消。

在实际汇率方面，证据不十分清楚，但九个国家中有六个国家实际汇率是随自由化开始而贬值的（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墨西哥，秘鲁，乌拉圭及委内瑞拉）。在这六个国家中有三个国家经历了大幅度贬值（玻利维亚，墨西哥及委内瑞拉）。同自由化初期相比，自由化后期有五个国家（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墨西哥，厄瓜多尔及委内瑞拉）的实际汇率贬值，二个国家（阿根廷，秘鲁）上升，另外二个国家（巴西，乌拉圭）则不变化。

实际汇率不是政策工具。在其他因素中，它反映宏观经济政策的总趋势。这几个国家能在长期里，持续降低通货膨胀（阿根廷，玻利维亚，墨西哥，秘鲁），或者将其控制在中度水平（厄瓜多尔，哥伦比亚，乌拉圭）。这些国家稳定经济成功很好地证明，成功的重要因素不仅需要贸易改革，而且需要整个经济结构重建的一揽子计划。

能否使通货膨胀长久地在控制之下，将影响到金融制度的生存及政治的稳定性。稳定性及结构改革的综合影响给金融系统产生很大压力。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秘鲁及委内瑞拉的金融系统已经历了不同程度困难。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它们是否能有效地处理好这种挑战。

宏观经济政策控制失败以及通货膨胀可能影响到政府对维持现有政策的意愿及决心，所以，除委内瑞拉外，还没有主要反对贸易改革的逆流。其他八个国家，贸易改革已得到公众及大多数党派的支持。在这方面，这促使了九个

国家同意加入乌拉圭回合的多边贸易协定，并且显示了对加入西半球自由贸易协定的强烈兴趣。

早期研究发现贸易改革持续六年或以上，几乎肯定会持续的更长久。基于这个发现，玻利维亚，墨西哥，乌拉圭似乎在安全的途中。它们的自由化不仅持续超过六年，而且承受住了政府更迭的考验。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墨西哥，厄瓜多尔及秘鲁的未来是令人鼓舞的，阿根廷及秘鲁将加入巴西，哥伦比亚的行列，在新的政府管理之下，并且有机会考验贸易改革的反复。委内瑞拉的自由化不是在经济崩溃情况下进行的，因而，从自由化开始，公众对政府的支持发生了动摇，其政治未来象其他国家那样走的那么远，并且新政府较前政府不那么热衷于贸易改革。

总之，目前改革的拉美国家全部满足了早期对持久贸易自由化的研究中所作出的四条基本条件：即坚定地向往自由化迈出第一步，减少数量限制，具备强烈改革的初始经济条件及政治的稳定性。在某种意义上讲，稳定性是指连续，广泛的对改革的支持。有些自由化已经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在政治过渡中生存下来。

早期研究已经强调了实际汇率在自由化初期及末期时贬值的重要性。我们观察到六个国家的自由化是在实际汇率贬值时进行的，另外二个国家的实际汇率在自由化后有所上升。早期研究还特别发现，当改革后期实际汇率上升时，自由化没有一个成功的。除玻利维亚外，在自由化完成之后，所有国家的实际汇率都趋于上升。这种持续上升主要原因表现在资本市场的立即开放，结构改革，以及国家对政局稳定的努力。早期研究中，在三十六个改革阶段里，只有四个改革阶段资本市场自由化是在贸易自由化引入时或稍后进行的。没有什么资料能用于彻底评价实际资本流入在贸易部门的作用，以及这种流动的减少对外汇储备量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不过现有的证据显示资本流入对贸易部门产生负作用，并且当这些流入实际减少时，其对外汇储备及自由化命运产生负影响。在不远的将来，这种模式重复的可能性可以从最近发生在墨西哥的事件中看到些迹象，如果资本流入在这些国家里得到同样的发展，现在很难说明政府是否会设法抵制这种后果。象八十年代早期智利那样成功，或象阿根廷那样在八十年代早期屈服于压力，从而改革失败，后果是很难完全预知的，部分因为现在资本流入的特性十分不同于七十年代，当时引入是一个大量的私有资本及外国直接投资，并且部分是因当前政治气候无疑不象过去那样，而有利于自由化。

⁷ 但政策是坚定的，并且是迅速的。

进一步推测，强烈的贸易改革导致大量的资本流入是在经济结构重组进展顺利时，这对贸易部门将有不利的作用。同这一论点一致的部分证据是，自由化完成后，出口增长率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是同步的。

此外，改革之前这些国家有打击严重经济成本通行的政策，其总体经验也许已使广大政策制定者及公众相信：尽管存在过渡经济成本及导致一系列严重倒退的事件，减少控制及贸易自由化仍是必由之路。

4. 前苏联的贸易体制

这部分所涉及的内容与前部分是截然不同的。前苏联贸易自由化模式作为其整体经济制度改变的一部分，期望其具有拉美国家贸易改革的许多共性是不恰当的。在这里我们只详述新生的贸易体制中的基本要素，并且提出有关未来自由化基本成份的问题。前苏联（延伸到更广，亦指苏联外围的前东欧，经互会成员）已在国际事务中完成戏剧性的变化，它在其他经济生活方面亦是如此。是否能将其认为是“贸易自由化”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用目前流行的政府干预工具来判断贸易自由化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那么前苏联则经历了一个与自由化相反的改革。另一方面，如果把自由化理解成象我们认为的那样一种过程，也就是使相对价格更接近在无政府干预下所能存在的价格，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价格取代非价格的干预性工具，那么前苏联各共和国已实施了不同程度的自由化。

在苏联解体之前及朝市场经济转变时期——指一九九零年末及一九九一年初——现在的各个独立的前苏联共和国的“国际”贸易，事实上以国内贸易为主。平均来讲，总贸易量的80%是在各共和国之间进行的。独联体与其他经互会成员的贸易占另外20%的相当大的比例，其贸易也具有有一些独联体内部贸易的重要特点。这种贸易不具外贸特征，它不需要外汇手段，而用当地货币支付，经同一个金融系统筹资；从这种意义上讲，是在没有支付障碍下进行的完全“自由”贸易，象独联体内的任何其他贸易一样，独联体之间的贸易不受任何市场机制的指导，亦不遵从相对优势的原则。经济活动的配置及各企业与贸易的关系——无论独联体内部或与独联体外部——完全取决于行政命令，产品及贸易模式与所相应的市场关系纯粹是在偶然情况下建立的。

向市场机制转变（大多数仍是部分地转变），至少导致了贸易有些近似于自由市场下的贸易模式。但是国家干预仍是很多，甚至可能在高度保护的市场经济

⁸ 当然不包括几个与自然资源的物理有效性有关的例子，例如，原油的生产是在发现地（但加工并不一定在那里）。

济部门，对贸易的歧视比自由化之前更严重。不象拉美市场经济那样（不包括阿根廷一九九零年以前的市场经济），前苏联贸易的干预工具是针对出口而非进口。进口大多数是自由的，有关税或无关税壁垒；然而出口几乎在所有前苏联共和国中严重地受到干预，通过出口税（外汇利益以低汇率形式被强行销售）及流行的出口许可证。

不鼓励出口原因是多方面的，多数是前苏联所独有的，或是因为体制的性质，或是因为共同的约束力影响。在苏联解体前后，这些国家都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投入不足：对一个企业来讲，保证其必要投入的有效性是最起码的。政府部门利用其保留的权力，对所属企业进行出口限制（如：机械制造业，多数是中等投入，也有一些消费行业），从而增加国内的供给。事实上，总体投入随着由出口提供的进口购买力而增加，但这超出了有关机构考虑的范围。

对出口货物维持经常性国内低价是一个关键因素。在该系统里，经常伴随着真实大幅度贬值，——这里将简单讨论这个问题——，买进地方产品，转手在出口市场卖出从中谋取高利。出口许可证的提出就是为了防止前面所提到的那种出口及将出口所带来的利益（经常是巨大的）分配给政府认为应该接受的团体。应该注意到，在价格差异下，防止出口实际上是福利事业的增长，在国内使用出口的好处超过出口收入所得⁹。简而言之，虽然改变了价格系统，权衡起来出口税较出口许可证是更好的工具。

实际上，对出口限制的另一个动机是增加税收。税收的增加是通过直接税或经常是通过在汇率低于市场，或汇率在“自由”水平时（自由进口筹资时的汇率），政府迫使出口者将出口销售收益交给政府来实现的。采取后一种手段的动机——强迫销售——是政府认为外汇市场不能提供出口利益，政府应取得出口利益（要求政府作为出口者及外债的支付者）。换言之，假设政府在“自由”汇率下不能有效地买进足够的外汇，政府的外汇储备比“自由”汇率及支付出口者的“惩罚”汇率的差额要高得多。

直到最近，独联体仍用卢布的地区（不包括波罗地海地区）存在一种阻止独联体之间出口的动机。向另一个共和国出口时，该国家可被用卢布支付；但它（中央或俄罗斯或周边国家）可以自行发行自己的卢布（周边国家发行的不是硬卢布），没有真正的成本，所以出口等于完全被浪费掉。当俄罗斯开始抑制这种可能性时，这个动机已在周边国家中消失；但今天仍存在于俄罗斯本身。

象已注意到的，真实贬值是独联体具有的共同的特点（不包括波罗地海地区及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四年间的俄罗斯）。这种贬值部分是由于贸易体制本身对出口实行严格控制造成的（其导致了恶性循环——大幅度真实贬值，进一

⁹ 贸易的歧视形式是 Abba Lerner 著名“对等性理论”恰当的代表。

步加强了限制出口的动机)。其他决定性的因素有,大量资产要求外汇兑换,流动外资几乎是唯一可以用来抵抗通货膨胀的工具。另一个根源是大多数独联体贸易条款已经恶化,这主要是由于独联体之间原油交易的价格变化造成的。油价由低于世界油价升到接近世界油价水平——这个变化给俄罗斯带来好处,却增加了大多数共和国的支出。

汇率水平曾是主要抑制进口的力量(从出口限制转为对进口限制)。因为在自由化过程开始时,不存在进口壁垒,没有对附加保护的要求(通过汇率产生效果),几乎进口不存在特有的障碍。不奇怪,波罗地海地区没有这种现象,主要是在爱沙尼亚及拉脱维亚地区出现实际升值。这两个国家已提出了逐渐增加保护抵制进口的要求。的确,已经产生了关税及非关税壁垒。主要反对农产品进口。至今这些壁垒已成为经济扭曲的主要根源。在这个意义上讲,它们背离了贸易自由化。

独联体国家的贸易自由化是由什么构成的?如果不在更广泛的内容上讲,其自由化没有多少意义。这就是:贸易自由化只有作为价格体系及价格机制总体改革的一部分才具有意义,否则,它即不可行又不是所期望的改革。

假设总体价格是由占统治地位的市场机制决定的,并接近其平衡水平,贸易自由化主要由下列措施组成:

- i) 消除出口壁垒:壁垒是指出口许可证,税款,强制销售外汇利益及(间接地)强制销售出口产品给指定的企业。
- ii) 建立外汇市场:正常贸易自由化可以创立一种不带非情愿下的“自由”交易体系——外汇市场(固定汇率或是浮动汇率)发挥作用。在该外汇市场里,售出大多数的出口利益,以及获得进口所需的资金。
- iii) 第三个主要贸易自由化措施是负向的:抑制进口关税壁垒。在前苏联大多数共和国实际高汇率所提供的较高程度的保护下,目前缺乏这种壁垒不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当汇率处在“正常”水平,不再有汇率保护时,进口不受限制,这才是真正地维护自由贸易系统的措施。

贸易自由化的持久性也取决于自由化引入的必要条件及自由化主体的实施。最首要的是贸易体制的转变必须是综合性经济自由化的一部分:在价格没有全部自由放开下,进入平衡市场水平,贸易自由化不可能有持久地发展(象所希望的那样)。总体的稳定是基本的,也应象“正常”市场经济要求的那样。也要有个功能健全的外汇兑换市场(是指有一个合理起作用的金融体系)。但另一方面,开放外资市场对贸易自由化的持久性似乎不是必要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太多的经验)。

参考资料

1. Alam, Asad (1992). “国家贸易简介: 拉美国家及加勒比海地区” 世界银行
2. Edwards, Sebastian (1993). “近期拉美国家的贸易改革” 北美经济及金融期刊, 第4卷, 第1期, 5~28页。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若干问题, “国际金融统计” 华盛顿特区 IMF
4. Michaely, Michael, Demetris Papageorgiou, and Armeane M Choksi (1991) “外贸自由化, 发展中世界的经验教训”. Basil Blackwell, Oxford England, and Cambridge, Mass. 第7卷
5. Michalopoulos, Constantine, and David G. Tarr. (Editors) (1994). “新独立国家的贸易” 过渡时期的经济研究, 13期. 世界银行/UNDP, 华盛顿特区。
6. Pspshrothiou, Emmytid, Armeane M. Choksi, and Michael Michaely (1990). “发展中国家的外贸自由化经验教训” 世界银行出版社. 华盛顿特区。
7. 世界银行 (1994). “世界表格”, 华盛顿特区: 世界银行。

表 一

近期拉美国家贸易自由化阶段

阿根廷	(1989 年 7 月 -- 1991 年 4 月)
玻利维亚	(1985 年 8 月 -- 1990 年 2 月)
巴 西	(1990 年 7 月 -- 1994 年 7 月)
哥伦比亚	(1989 年 9 月 -- 1991 年 12 月)
厄瓜多尔	(1990 年 5 月 -- 1992 年 8 月)
墨西哥	(1985 年 7 月 -- 1989 年 12 月)
秘 鲁	(1990 年 8 月 -- 1991 年 8 月)
乌拉圭	(1987 年 7 月 -- 1992 年 4 月)
委内瑞拉	(1989 年 2 月 -- 1991 年 7 月)

圆括号内的日期显示自由化时期，覆盖了主要的贸易改革法规。

来源：Alam, Asad (1992). “国家贸易简介：拉美国家及加勒比海地区”
世界银行, Mimeo.